

走出文革

救贖

(接上一期)

1967年1月17日和1月19日，我先後貼出兩張炮打康生的大字報。這第二張大字報貼出時，清華園裏已是“黃洋界上炮聲隆”了。

在我起草的大字報上署名的除了同班同學孫常秋(左一)和陳國光(左二)兩人外，還有劉泉。

劉泉在大字報上署名實屬意外，而在日後却代我受過。

劉泉和我都是工程力學數學系的學生。文革初，他因反對工作組而全校聞名。1966年8月4日，周總理在清華

全校大會上當着一百多名中央委員和全校師生的面親自為蒯大富和劉泉平反。

在我的印象中，劉泉雖是高幹子弟，但十分樸素隨和。他比我低一級，但住的宿舍和我相鄰。我將大字報寫好後正好是吃晚飯的時候，他端着飯碗笑嘻嘻地走進我的宿舍。

我開玩笑地問他是否願意簽名。不料他看完我寫的大字報後不假思索便簽上了他的名字，並給大字報擬了一個標題：“康生同志，我們懷疑你！”，說他早就懷疑康生是壞人，但稱康生為同志可以留有餘地。

遺憾的是，後來我們被批判處理時康生同志並沒有因此而領情，給我們留下什麼餘地。

1月22日深夜，陳伯達給蒯大富打來電話，嚴詞指責清華大學學生炮打康生一事。劉泉因他的井岡山兵團二號人物地位成了大字報的罪魁禍首，並因此而生坎坷。

我的“願不願在大字報上簽名”的玩笑話使劉泉蒙受了多年磨難。

一年多後，我的“敢不敢從右面這條路走”的玩笑話又使陳育延經歷了生死考驗(《救美》)。

人生真是玩笑不得。

公正地說，這同當時清華大學越演越烈的派性鬥爭有關。在炮打康生一事被鎮壓後的一天，我在大禮堂前看大字報時遇到日後成為414派一把手的沈如槐。他摟着我的肩膀說：“和我們一起反老蒯吧。”

我受寵若驚，指着他們那些批判蒯大富和劉泉炮打康生的大字報說：“可是炮打康生的大字報是我寫的呀。”

沈的回答頗具政治家的風度：“我們的矛頭是針對蒯大富和劉泉的，我們不排斥其他炮打過康生的同學。”

文革中有一句名言：派性掩護敵人。看來我便是一個被派性掩護的“敵人”，盡管我後來也並沒有逃脫炮打康生帶給我的厄運。

雖然炮打康生一事對全國的政局並無多大影響，但對清華大學的文革進程卻至關重要。我無意評判清華兩派的是非恩怨，414派的一些政治主張在今天看來確有其“必勝”的道理，但蒯大富和劉泉參與炮打康生一事無疑為沈如槐等414派領袖們積聚反對蒯大富的政治力量提供了很好的機會。

當北洋政府撤了蔡元培北大校長一職時，滿清保皇派、北大教授辜鴻銘拖着長辮子從妓院趕回學校，在北大教師的抗議書上簽上他的大名。他說：我不管你們的抗議書上寫了什麼理由，我的理由就是保皇。蔡元培是校長，校長就是我的皇上。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文革時期的造反和辜鴻銘的保皇有着同樣的邏輯：誰掌權便造誰的反(或保誰的

皇)。清華黨委掌權時，造黨委的反；工作組掌權時，造工作組的反。輪到蒯大富掌權，成了“蒯司令”，他也就成了炮轟的目標，造反的對象。

無論是他日無中央“智擒王光美”，還是膽大妄為“炮打康生”，當時都被反對他的學生一陣猛轟。而掌了權的蒯司令也如同鎮壓過他的工作組一樣，視反對他的學生為“托派”、“反革命”，必欲除之而後快，最終釀成武鬥，走向了歷史的反面。

文革中的那些事兒往往撲朔迷離，後人祇能以成敗論英雄。當年鼓吹“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譚力夫後來成了反對中央文革的英雄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所以，文革那段歷史是不能深究的，否則，英雄的臉譜上也會被發現塗有令人可笑的油彩。

文革初期曾出現過一些零星的炮打中央文革的大字報。1967年1月中旬北京清華等校學生炮打康生是第一起集體炮打中央文革成員的政治事件。1967年1月底和1968年4月12日，上海復旦、交大等校學生兩次炮打張春橋成為第二起集體炮打中央文革成員的政治事件。

由于卷入人數眾多，這兩件事對個人命運產生的影響也就廣泛而深遠得多。

當北京的學生因炮打康生而遭受磨難時，上海復旦大學學生胡守鈞等人因炮打張春橋而身系囹圄。七十年代中，我去上海拜訪了胡守鈞小集團的三號人物，“黑桃皇后”邱勵歐。

在溧陽路上一間還殘留着上海灘舊日建築韻味的屋子裏，歷盡磨難的黑桃皇后依舊風姿綽約。當她呷着咖啡，用細軟的吳語講着市井傳聞

時，我完全無法將她和各種小報上描繪的那個出謀劃策的女將聯繫起來。她喜歡文學，禍從“筆”出，胡守鈞一案便是從她的那些通信中找到突破口的。

晚年的邱勵歐居住在美國俄州Erie湖邊，孤寂一人，聽着淙淙的雨聲回首往事時，不免感慨萬千，吟詩填詞悲嘆“人生苦旅本飄蓬”。

1968年底，當我面臨畢業分配時，工宣隊給我做了“犯有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嚴重政治錯誤”的畢業鑒定。在那個年代，這頂嚇人的帽子是足以將我投入大獄的。

感謝工宣隊“給出路”的政策，我得以分配工作，但如曾昭奮先生所言，“他成為數學家的前途是徹底葬送了”。我被送到解放軍農場接受再教育，一年半後被正式分配到四川省雅安縣一個小化肥廠工作。接待我的是雅安地區大學生分配辦公室的一個幹部，在得知我在清華學的是流體力學專業時，他先是驚訝，繼而十分誠懇地安慰我說：化肥廠的管道裏都是流體，你的專業會有用的。

其實，我當時關心的並不是專業對口的問題，而是如何應付頭上那頂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大帽子。離開清華後的十年中，我小心翼翼地夾着尾巴做人，因為無論到哪裏，我都逃不了被審查或批鬥。來自清華和黨校的外調公函如同噩夢一樣揮之不去。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發現，在我的檔案袋裏各種關於我炮打康生的材料居然有一寸多厚(《珞珈山下》)。

沉重的歷史包袱促使我繼續關注風雲變幻的中國政治舞臺。我將救贖的希望寄托在康生的垮臺上。文革後期的黨內鬥爭使我完全相信康生的問題會有暴露的一天。那時



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

候我最擔心的倒是康生過早死掉而被蓋棺論定。

1974年我調到武漢一所大學工作。次年12月的一天，我正在學校附近的一個理髮店理發，忽然聽到遠處收音機裏飄來哀樂和“光榮的反修戰士”幾個字，我立即就明白康生死了。康生參與過中蘇論戰，反修戰士是他頭上的一頂桂冠。那是我十年中最感沮喪的一天。

四人幫剛倒臺時曾盛傳“康老臨死前揭發張春橋和江青歷史上都是叛徒”。這個傳聞也讓我心涼了好一陣。

康生和四人幫狼狽為奸，這本是不爭的事實，四人幫的倒臺讓我看到了康生的末日。豈料他臨死前還能預知未來，試圖將自己和四人幫撇清，真不愧是老謀深算。

我從懷疑康生兩面三刀、文過飾非始，十年後又一次見識了他生平最後一次欺世盜名的高超伎倆。

1978年，這個惡貫滿盈，早已在黨內遭人側目而視的弄臣終於難逃遺臭萬年的下場。同年，清華大學將我的檔案召回，銷毀了那一寸多厚的炮打康生“罪證”。(未完待續)

南京·東京(十五)



本報特約作家 鄧雷

(接上一期)

劉洪友也考慮過辦期刊，但是因制版印刷成本太高，一直沒有落實。他把自己的顧慮告訴齊藤香坡，請他指點一二。

齊藤香坡把自己辦的期刊拿來讓劉洪友參考。他告訴劉洪友，辦刊最難的是制版，既然花不起高昂的制版費，可以像我這樣用手工做，主要方法就是剪和貼。

劉洪友曾經也試過這個方法，但是粘貼後印制出來的版面不幹淨。齊藤先生就把自己用的膠品名說了出來，而且把多年試驗摸索出來的經驗，毫無保留地告訴了劉

洪友。

有時發現制版錯誤，需要修改，劉洪友不知道用什麼方法好。

齊藤先生拿出一塊特殊的橡皮，親自擦拭給他看，告訴他用這種橡皮修改起來極其方便。這些都是個人的商業秘密，齊藤香坡的這種無私相助，讓劉洪友感動不已。

不僅如此，齊藤香坡還進一步告訴劉洪友怎麼利用學習成績排名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怎麼提高學生的書法技能，等等。凡是劉洪友提出來的問題，他都盡自己所知和盤托出，不留一絲一毫秘密。他是酒後吐真言，下意識地說出來的嗎？不，絕對不是，他是有意在幫劉洪友。

得到齊藤香坡的辦刊秘笈，劉洪友創辦了《溫故》雜誌，期刊名出自《論語》的《為政》篇，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劉洪友想借此來鼓勵自己的學生，溫習舊知識，從而得到新的理解與體會，他希望更多的學生成為書法教育的名師。

在齊藤香坡的指點下，劉洪友全面策劃了《溫故》的欄目和內容。每月一期，分為中日兩國歷史文化介紹、中國各種經典書體的系

統分析鑒賞、中國古典詩文學習、篆刻學習與創作、小楷寫經和硬筆書法創作、學員優秀作品選登、青少年硬筆書法、學員的成績公布、與書法相關的趣聞軼事、學員本月心得選登等十大板塊。

在劉洪友看來，既然學書法，那就應該了解當今書法界的現狀，了解頂級書法藝術家的藝術成就及其社會影響。通過對中日書法家作品的對照比較、特點分析，使學員有明確的學習目標與發展方向，進而開拓自己的書法創作道路。

系統地學習中國古典書法，介紹中國歷史文化以及中日文化交流史，是《溫故》區別與其他期刊的重要特點，是書法入門的必修課。各種書體組成“書法”的內涵，是教材的靈魂。合理選擇各個時代經典的楷、行、草、隸、篆、篆刻以及假名書體進行學習，對學習提高書法藝術技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另外，中國古典文學中漢詩的學習也與書法藝術密不可分。《溫故》每期選擇中國古典文學中具有代表性的唐詩、宋詞、元曲，翻譯成日文，並詳細解讀詩文內容及時代背景。在此基礎上，老師提供書法創作範例，學生在四尺整張紙上創

作完成一首詩文書法作品，以提高學生的興趣和成就感。

在篆刻學習創作方面，側重于摹仿清代傑出藝術家吳昌碩的印稿，用文字解釋幫助學員分析理解。同時要求學生用清末篆刻大家吳讓之、徐三庚創作的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字體為範例，選擇適合的文字創作成語篆刻作品。學員們會根據這些要求，自行設計印稿、上墨填印、篆刻、整修、打印，最後蓋印完成。

學員習作選登欄目最受歡迎。經過嚴格審查評選，選出優秀作品展示在教材上，其中最優秀的兩幅作品，由老師點評，供大家學習參考。每期雜誌上有半紙、條幅、扇面、中堂、鏡面、門方、橫批、寫經、硬筆、假名、篆刻等樣式齊全的書法作品，肯定了學員的學習成果，鼓勵優秀學員繼續努力，同時又帶動大家積極進取，營造出一種爭先恐後、互幫互學的學習氛圍。

《溫故》月刊目前已出版發行200多期，是書法教學與交流的重要園地，深愛書法愛好者和期刊收藏者的喜愛。

劉洪友說：“齊藤香坡不僅僅在期刊創辦中對我有無私援助，後來他還把我介紹給各種書法展覽

主辦方，並推舉我做了神奈川相模原書法展的高級審查員，接下來，他跟我島南龍老師一起，聯手將我推上了產經國際書展高級審查員位置，讓我進入了日本書法界的主流社會。齊藤香坡比我大二十四歲，他沒有子女，把我當兒子來對待，我對他非常尊重，我們倆相處得形同父子。現在回想起來，當初如果没有他的相助，我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後來劉洪友有了發展，也想着回報亦師亦父的齊藤香坡。齊藤香坡多次參加中日書法交流展，但還沒有在中國辦過個展。2004年，劉洪友策劃為齊藤香坡在南京舉辦了“香坡的世界”個人書法作品展，展出地點設在南京博物院，來看展的人絡繹不絕，業內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多家媒體報道了日本書法大家齊藤香坡作品在南京展出的消息。齊藤香坡對這次展覽的規格和組織十分滿意。

齊藤香坡坦言：“我幫助劉洪友，是因為我看中了他的書法才華和潛能，他今後一定能超越我，實踐證實了我的預想。我也跟他說過，今後要幫助那些有潛能的年輕人，一代超過一代，書法藝術才能有更好的明天。”

南京·東京(十六)

在日本打拼的劉洪友事業有了起色，白天忙忙碌碌，晚上回到住處，躺在床上，靜下來便會想妻子、女兒。他就把自己每天生活的點點滴滴、每天的進步以及每天的思念都通過鴻雁傳書告訴妻子羅華。通常過幾天他就會給羅華寫封信，閱讀太太的回信是他最開心

的一件事。

國際信函在郵寄過程中需要七八天，劉洪友覺得等待的時間太漫長，生硬的字迹不足以表達對太太的思念，他還想通過電話聽聽妻子的聲音，聽聽愛人動人的笑聲以及互訴衷情時的哽咽，所以他每周都要給羅華打一個電話。日本規定晚上十點後話費減半，為了節省開支，為了能在同等話費下多說幾

句體己話，他們每周一次的通話都安排在十點。東京路邊的電話亭和南京安靜的辦公室，他們通過一根銀線訴說衷腸，互吐思念，情到深處泪流滿面，一根電話綫牽着兩顆相愛的心。

這種牛郎織女式的兩地分居生活就這樣持續着，不知何時是盡頭。劉洪友想盡早結束這個局面，下決心早點把太太接到東京。

隨着事業發展，手上有了點積蓄，劉洪友在練馬區石神井租了一套更大的房子，為太太來日本做好了準備。

日日思君不見君，才下眉頭却上心頭。羅華更想早點到日本與丈夫團聚。兩人商量，羅華先來日本，站穩腳跟後，再接女兒來東京。

劉洪友帶到日本刻印的石頭已經告罄，他讓羅華順便帶些印石

來。

羅華專門找了一款結實的雙肩包，在家裏試着能背多少石頭，她想盡量給劉洪友多帶些，最後稱了一下，這包石頭有近百斤重，對一個弱女子來講，背在肩上特別吃力。可有愛支撐的她不覺得這是一堆單純的石頭，更是丈夫的重托，再重也要帶過去。(未完待續)